

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关系再认识

——以维经斯基与孙中山的互动为考察中心

周利生 王钰鑫

内容提要 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驻华代表,曾经六次赴华,活动时间累计达四年之久,与中国大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依据俄方解密档案,以维经斯基为主体,对两人的会见、维经斯基与三民主义的新解释、维经斯基对孙中山的支持、维经斯基对孙中山的悼念等加以考察,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的关系。

关键词 维经斯基 孙中山 共产国际 中国大革命

周利生,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330022

王钰鑫,桂林航天工业学院思政部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 541004

一、维经斯基与孙中山的会见

维经斯基六次来华的时间依次为:1920年4月至1921年1月、1921年4月至5月、1924年4月至7月、1924年11月至1925年2月、1925年7月至1926年1月、1926年6月至1927年6月。第二次来华是准备参加原定1921年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时间短暂而未及与孙中山会见。维经斯基第四次来华的情况是,1924年11月底到达上海,而北上途中的孙中山则离开上海绕道日本去北京,两人未能谋面。第五次、第六次来华时,孙中山已经去世。因此,维经斯基与孙中山的会面是其第一次和第三次赴华期间。1925年3月15日,维经斯基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了题为《我与孙中山的两次会见》的回忆性文章,比较详细地描述了有关情形。

第一次会见的有关情况。1920年10月,陈炯明率领粤军驱逐桂系,占领广州;11月,孙中山离开上海赴广州,重组南方军政府。维经斯基说:“孙中山离上海到广州以后不久,我也得到一个偶然的来到广州”^[2]。这个“偶然的来到广州”其实是苏俄优林使团的要求。当时,优林使团正在北京活动,力图争取北京政府的外交承认,维经斯基南下广州,其意图就是了解南方政府的情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11BKS027)、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专任项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10JD710004)阶段性成果。

[1][俄]K·B·石克强、李玉贞:《俄罗斯新发现的有关中共建党的文件》,[北京]《百年潮》2001年第12期。

[2]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页。

况^[1]。经陈独秀引见,维经斯基会见了在上海法租界租住的孙中山。维经斯基写道:“孙中山在自己的书房里接见了我们。”孙中山介绍了中国的辛亥革命以及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复辟帝制的情况。对于如何将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联系起来,孙中山“深感兴趣”。孙中山抱怨“广州的地理位置使我们没有可能与俄国建立联系”的同时,“详细地询问是否有可能在海参崴或满洲里建立大功率的无线电台”,以便取得广州与俄国的联系^[2]。显然,孙中山比较明确地表达了“联俄”的意图。但是,维经斯基对孙中山以及南方军政府并不满意:“政府中的意见分歧依然存在,在广州可以感觉到对未来缺乏信心”;“广州军队太涣散,纪律性差,不是一支象样的军事力量”^[3]。事实上,当时苏俄感兴趣的是颇具实力的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维经斯基在写给莫斯科的信中明确说道:“在中国目前的内战中,学生站到了吴佩孚将军一边,也就是说,他们支持召开国民会议的想法。我们赞成这个策略。”^[4]与维经斯基接触较多的包惠僧也证实,维经斯基主张联合吴佩孚以发动民主运动^[5]。

第二次会见的有关情况。四年之后,1924年6月上旬,维经斯基由廖仲恺陪同在广州会见了孙中山^[6]。孙中山把维经斯基看成是“从遥远的,但又与中国很‘亲近’的国家”的一位使者,甚至“想把这个来自苏联的人的声音、服装和风度做一番研究”。孙中山感兴趣的是俄国的“经济如何得到恢复”和“农民怎样生活”,因此“提出了关于俄国的许多问题”。会谈中,孙中山毫不掩饰自己的表情:当听说苏联的工业领域还没有达到战前产量时,孙中山“不太愉快,感到吃惊”;当听说苏联国民教育情况尤其是青少年教育情况时,孙中山又“喜形于色”。维经斯基则向孙中山详细介绍了列宁逝世后苏联国内的情况,并就刚签字的中俄协定“谨慎地探问了孙中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孙中山表示“深刻理解苏联和中国政府缔约的目的,以及该条约对于中国人民利益的意义”^[7]。此外,维经斯基还应孙中山的邀请,准备给即将成立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讲授有关俄国政党状况的知识,只是因时间关系未能如愿^[8]。不过,维经斯基此番赴广州并非专程拜见孙中山,而是作为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来广州指导太平洋运输工人代表大会。此次会议于1924年6月17日至23日召开,维经斯基被指定为大会的领导人^[9],在大会上还高度评价了孙中山。他说:“在所有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孙中山博士执政的地区是唯一可供被压迫民族的代表自由集会,讨论同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方法,以及同各国民族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的地方。”^[10]

二、维经斯基与三民主义的新解释

国民党一大对三民主义重新进行了解释,使之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对此,维经斯基起了重大作用。1923年下半年,鉴于维经斯基与孙中山已有接触和了解以及国民党的状况,共产国际成立了

[1]1921年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斯德拉霍夫在发给莫斯科的一份绝密文件《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中指出,维经斯基是“奉优林之命”去广州的。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60页。

[2][7][10]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110页,第112页,第101页。

[3][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60页、第62页,第34页。

[5]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页。

[6]维经斯基在1925年回忆说会见的时间是“夏天”,还说会见的前几天,中俄协定签字,这个协定签字的时间是1924年5月31日。因此可以推断,维经斯基与孙中山的会见应是在1924年6月的上旬。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室:《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111-112页。

[8]邵元冲1924年6月27日的日记记载:“讲习所已准定廿九日开学,予所任者,为各国革命运动之方法及策略,又以费丁斯克(即维经斯基,引者)归国,其俄国政党状况一课,亦由予兼任”。见邵元冲:《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9]翟作君:《共产国际顾问在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6页。

维经斯基等人参加的委员会,就“改组整个党(即国民党,引者)”做出“各种指示”^[1]。当时,蒋介石率领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正在对苏俄的党务、政务和军事进行考察。在共产国际领导人看来,代表团在莫斯科访问期间是提出修改国民党纲领的好时机。在这一背景下,维经斯基起草了对国民党一大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发生重要影响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

根据俄方解密档案可知,维经斯基起草的决议草案至少是在1923年11月23日以前已经完成,并于11月23日由季诺维也夫作为急件送交契切林和布哈林,以听取意见^[2]。11月26日,草案提交给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进行讨论。蒋介石在讨论中对草案表示认可:“三民主义,即孙逸仙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应当成为中国革命的政治口号。报告(即维经斯基起草的决议草案,引者)已对这些主义作了解释……。”^[3]会上,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成立由布哈林、克拉罗夫、库西宁、阿姆特和维经斯基等五人组成的委员会,“与国民党代表团共同起草详细决议”^[4]。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正式通过该决议草案。随后,决议迅速寄给正在中国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的鲍罗廷。1924年1月4日,时在上海的鲍罗廷致信维经斯基说,1923年12月30日已经收到“共产国际在孙的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期间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现在可以促使他们坚持提纲的精神,特别是在对待他们自己的‘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态度上”^[5]。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一大召开,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进行了解释。下表呈现了大会宣言与共产国际决议关于三民主义的阐述,通过比较可以清晰地发现二者的相似性。

可见,共产国际决议与国民党一大宣言关于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民族主义中的对外反帝以求解放和对内民族平等原则、民权主义中的革命民权原则、民生主义中的节制资本和耕者有其田原则都得到体现。1924年2月9日加拉罕在致契切林的信中说:国民党“如此驯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

关于民族主义: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及其走卒、为争取中国独立而斗争”;“宣布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	“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对于工商业资产阶级来说,民族主义意味着更好地发展国家的生产”;“对于国内各劳动阶层来说,民族主义就不能不意味着消灭封建专制的压迫,就不能不意味着,不仅要消灭外国资本的残酷剥削,而且也要消灭本国资本的残酷剥削。”	“其在实业界,苟无民族主义,则列强之经济的压迫,自国生产系永无发展之可能。其在劳动界,苟无民族主义,则依附帝国主义而生存之军阀及国内外之资本家,足以蚀其生命而有余。”
“国民党应公开提出国内各民族自决的原则,以便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军阀制度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这个原则能体现在由以前的中华帝国各民族组成的自由的中华联邦共和国上。”	“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

关于民权主义: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民权主义,不能当作一般‘天赋人权’看待,必须看作是当前中国实行的一条革命原则。”	“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下,民权主义可能蜕变为压迫劳动群众的制度和工具。”	“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
“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广泛享有这些权利和自由。”	“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力。”
“决不使那些在中国帮助外国帝国主义或其走狗(中国军阀)的分子和组织享有这些自由。”	“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力。”

[1][2][3][4][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07页,第313页,第331页,第329页,第394-395页。

关于民生主义：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民生主义，如果解释为把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上交通收归国有，那它才会对群众具有革命化的意义，才能在群众中得到广泛的反响。至于中国的民族工业，国有化原则在现在也可适用于它。”	“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
“必须向缺乏土地的广大农民群众说明，应当把土地直接分给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劳动者，消灭不从事耕作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许多小土地占有者的制度。……国家还应当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应当大力帮助农民解决灌溉、由人口稠密地区向人口稀少地区移民、开发荒地等问题。”	“于此犹有当为告农民者：……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植荒徼，以均地力。”

和共产国际的决议”^[1]。唯一的重要区别是，共产国际决议提出通过“消灭不从事耕作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许多小土地占有者的制度”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而国民党一大宣言对此土地来源没有进行明确解释。鲍罗廷在国民党一大期间曾试图说服国民党接受共产国际决议的提法，但没有成功^[2]。

对于经过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维经斯基表示了欢迎。他说：“毫无疑问，新三民主义深受中国人民大众的拥护，促使群众团结在国民党周围，因为它将进行反帝斗争。”^[3]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形成和通过，是诸多因素相互作用而实现的，然而，毋庸置疑的是，维经斯基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维经斯基对孙中山的支持

积极介入江浙战争、北上宣传国民革命是孙中山逝世前的重大政治活动，维经斯基予以大力支持。1924年9月3日，直系将领齐燮元与皖系残余卢永祥为“淞沪问题”发生冲突，江浙战争爆发。卢永祥电请孙中山“分道出师，兼程并进”，共同讨伐“乱国之曹锟”^[4]。9月4日，孙中山召集军事会议，决定“出师北伐，以为浙卢声援”；9月5日，孙中山发布宣言，指斥曹、吴“穷凶极戾，诚邦家之大慙，国民之公仇”，声明“刻日移北指，与天下共讨曹、吴诸贼！”^[5]9月18日，孙中山以中国国民党名义发布《北伐宣言》，20日，北伐军各部在韶关举行北伐誓师典礼。

是否介入江浙战争，中共中央有自己的主张。9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十七号通告：“此次江浙战争，显然是军阀争夺地盘与国际帝国主义操纵中国政治之一种表现；无论对于参加战争之任何方，若有人为偏袒之行动，都是牺牲人民利益来助宰制势力张目。”^[6]在中共那里，孙中山以北伐的行动支持浙江卢永祥一方，显属“偏袒之行动”。10月10日，陈独秀致信维经斯基，表明了中共的态度：“我们应当反对这种战争，尤其要反对列强对中国事务的干涉。”陈独秀同时批评了国民党“仍然坚持老政策”，坚持“同张作霖和卢永祥联合”^[7]。

维经斯基并不否认江浙战争在性质上仍是一场军阀之间的混战^[8]，但是他支持孙中山积极介入江浙战争。1924年9月，维经斯基出版一本名为《中国当前的政局》的小册子，替孙中山支持卢永祥的立场辩护，并列出了三条理由：其一，直系直接威胁。“孙中山之所以可能卷入这场斗争，是因为直系直接威胁着他，而奉系与原皖系的支持者同广东省在地理上并非毗邻。”其二，统一战线的需要。“孙中山领导的运动，就是消灭整个督军制度的运动，因此他必然紧急参与反对军阀的斗争，而且有时出于战

[1][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14页，第538页。

[2]周利生：《鲍罗廷与中国大革命》，〔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3—65页。

[3][8]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维经斯基在我国的有关资料》，第30页，第24—26页。

[4]罗家伦：《革命文献》，〔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经售1978年版，第1503页。

[5]《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页。

[6]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85页。

略的考虑联合一些军阀去反对另一些军阀。”其三,孙中山介入江浙战争与军阀混战有本质的区别。“无论是孙中山抑或张作霖大概都是心照不宣:一旦他们打败了直系,紧接着的将是他们之间的一场斗争……。但是,孙中山的武装斗争与军阀的相互争斗根本不同,因为孙中山在斗争过程中,在他的管辖范围内解放中国劳动阶层的人民。”^[1]

需知,《中国当前的政局》这本小册子在当时倍受重视,1924年9月由莫斯科国家出版社出版,一个月之后再版,是苏俄“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该协会组织出版的系列丛书中的第一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部长拉狄克为该书撰写了序言,高度评价该书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内战形势的“凤毛麟角”式的著作^[2]。由此可见,维经斯基此举是对孙中山北伐的重要声援。

1924年10月23日,第二次直奉战争进行之际,直系将领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电请孙中山北上,北方政治局势顿时出现重大变化。10月27日,孙中山致电冯玉祥,赞扬冯玉祥等人“义旗聿举,大憨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并表示:“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3]

对于孙中山的北上,国民党内部存在着反对的声音。吴铁城回忆说:“对于北上和段氏商谈,有些同志,力表反对。”^[4]胡汉民就认为孙中山北上是不明智的和不可取的^[5]。维经斯基继续对孙中山北上表示支持。他指出,孙中山的北上“是在政治上迈出了正确的一步”,“自中国革命以来,现在第一次出现了孙逸仙不仅仅在一个广东省可以起政治作用的局面”,说明了中国国民运动日益高涨。国民党可以“通过巧妙的随机应变”就有可能成为吸引“中国新兴的民族军事力量”的“政治中心”。维经斯基批评反对孙中山北上的“左派”同志“错误地评估了战胜直隶集团的意义,没有看到新的形势为深入开展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创造的条件”,指出要利用这个“扩大了的政治舞台”,“为国家的统一,为反对外国的压迫而斗争”^[6]。

为了支持孙中山北上行动,维经斯基要求中共“利用目前的过渡时期来最大限度地震动中国的舆论界”,并致信加拉罕,请求他从给予国民党的经费中拨出一部分给共产党用来“开展强大的宣传运动”,比如将《向导》周报的印数“增加一到二倍”,“出版几万几十万的呼吁书、传单和通俗小册子”等等^[7]。维经斯基还亲自参加了《向导》编辑部的业务工作,并以魏琴为笔名发表了大量论述中国革命的文章,主要有:《列强与中国国民会议》,第95期(1924年12月17日);《英国机关报的狡猾论调》,第95期(1924年12月17日);《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之宣传》,第96期(1924年12月24日);《国民会议、军阀和帝国主义》,第97期(1924年12月31日);《舒尔曼与美国的对华外交》,第97期(1924年12月31日);《帝国主义与反基督教运动》,第98期(1925年1月7日);《列宁不死》,第99期(1925年1月21日);《论日本之承认苏俄》,第100期(1925年1月28日)^[8]。与此同时,在维经斯基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加强了北方地区的工作,成立北方局,代表中央指导山东、河南、山西、直隶、内蒙和东北三省的工作,并规定各地委应服从北方局领导^[9]。

[1][2]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维经斯基在我国的有关资料》,第24-26页,第50-51页,第43页。

[3]《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2页。

[4]吴铁城:《吴铁城回忆录》,〔台北〕三民书局1981年版,第149页。

[5][美]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杨慎之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03页。

[6][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555-556页,第557-558页。

[8]维经斯基还以“卫金”为名,在《新青年》季刊第4期上发表题为《广东政府与国民革命》(1924年12月20日)的文章。

[9]1924年12月19日,维经斯基在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中提及:“为了更好地在中国北方和满洲开展工作,两周前我们成立了党中央北方局,有7名负责同志参加该局工作,其中有张国焘、谭平山和瞿秋白同志。局址设在北京,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归来的同志几乎都担任负责工作,工作完成得很不错”。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562页。

孙中山逝世之后,维经斯基仍高度评价了孙中山此次北上行动。他说,北上后的孙中山“成了全国的中心人物,成了中国同世界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斗争的代表”。“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活动,是其一生中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对中国人民来说,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个时期。”^[1]

四、维经斯基对孙中山的悼念

孙中山病危时,维经斯基正在中国。回国前夕,他特别提示中共中央:“为防备孙(指孙中山,引者)去世,你们需要起草一个宣言,不仅是给一般群众的宣言,而且也是给国民党中央的宣言,号召在国民党一大通过的行动纲领基础上团结起来”^[2]。为此,孙中山逝世后,中共中央相继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和《中国共产党致唁中国国民党》。孙中山逝世后的第二天,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开展一系列吊唁孙中山的活动,维经斯基负责“照料”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的纪念孙中山的群众大会^[3]。

为了纪念孙中山,1925年3月23日,维经斯基在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题为《孙中山与中国的解放运动》的文章。文章指出,早在1895年孙中山就开始了推翻中国君主制度的努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孙中山建立了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并进而发展成为革命政党。文章高度评价了孙中山领导下召开的国民党一大,指出这“无疑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的一个最重大的事件”,“代表大会不仅是国民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孙中山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文章对孙中山逝世前夕的不屈斗争给予充分肯定:“逝世前六、七个月,孙中山对中国解放运动起的作用特别大。孙在声明行将终结的短暂时刻,好象在总结他为争取民众解放所走过的全部历程”。同时,维经斯基并不忌讳国民党改组前孙中山思想认识上的弱点,如:“不注意唤起中国民众去反对帝国主义”、“对于反帝民众运动的意义认识不足”、“没有全力参与全国的政治生活,尤其是对华北和华中的工人运动”等等。维经斯基解释说,指出这些弱点,“丝毫不想贬低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众领袖的作用”,“恰恰是为了使读者了解目前国民党在中国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了解孙中山近几年来是怎样站到中国人民大众的利益方面,使国民党维持下来,并有了战斗方向”^[4]。

维经斯基参与筹建莫斯科中山大学,也是纪念孙中山的重要举措之一。1925年3月1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扩大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分部或建立新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是适宜的”。会议责成东方大学校长布罗伊多和维经斯基就此问题拟定一份报告交政治局^[5]。4月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维经斯基等向政治局作了情况汇报。会议认为:“为中国学生建立500人的中山大学是适宜的”;决定“为说明建立大学、选择地址、确定其组成人员的措施,成立由布罗伊多、拉狄克和维经斯基三同志组成的委员会”^[6]。4月22日,维经斯基及时向在北京的加拉罕通报了中山大学建设的情况。他在信中说:“已决定在西伯利亚建立500人规模的孙中山大学。被责成研究这个问题的(拉狄克、布罗伊多、维经斯基)三人委员会认为,把这所大学设在莫斯科或列宁格勒是顺利实现这个想法的必要条件。”^[7]10月7日,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66次会议上,宣布莫斯科中山大学正式建立,建议国共两党迅速选派学员赴该校学习,有关选派工作随即开始,当时在广州的维经斯基直接参与了选派学员的具体工作^[8]。

身为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维经斯基与孙中山的面对面接触,使他有了深入了解孙中山的机会。维经斯基对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对孙中山的支持、对孙中山的悼念等等,都反映出维经斯基与中国大革命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责任编辑:肖波〕

[1][4]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维经斯基在我国的有关资料》,第136页,第127-137页。

[2][3][5][6][7][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579页,第581-582页,第588-589页,第594-595页,第609页,第745页。